

老舍爱戏



■ 语林指瑕

“邹鲁”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天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辞源》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喻指文化昌盛之地。”

《辞海》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孟子生于邹国,孔子生于鲁国,旧因用‘邹鲁’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

这种解释,实为牵强,甚至讹误。若“邹鲁”事涉孟子,则读法应为“鲁邹”,因为孔子圣也,孔子先也;若不涉孟子,则实指孔子一人。此事庄周最有发言权。

《庄子》一书的作者庄周(约前369—约前286),与孟軻(约前372—前289),两个人是同齡人,庄周只比孟軻小三岁。他们生活于战国(前475—前221)始后之百年,其时天下大乱,列国纷争,风气趋下。面对此情景,庄周在《庄子·天下》中,对此大有感慨。其文有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为明晰易懂起见,且用中华书局《庄子》书中对上述文字所作的白话译文:

古代得道者不是很完备吗?他们是具备了圣人和明王的道德,取得了天地,而能哺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于百姓,通晓大道的根本,掌握末端的具體法度,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大小精粗应时变化,无所不发挥作用。古代道术里明显表现在礼法度数方面的,在旧的法规法令中和世传和史书中多有记载;那些记载在《诗》《书》《礼》《乐》书中的,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大多还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天下大乱之后,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道德标准也出现了分歧。天下的人各以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可悲啊!百家的学术走向一偏而不知道回归,势必与古人的学术不能相合了!后世的学者,最为不幸的是,再也见不到天地的纯美和古人完美的道德风貌,古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的天下人所割裂毁掉了。

以此文观之,庄周对古代的得道者极力称颂,并对邹鲁之地学者和官吏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称许。“邹鲁之士”,以“邹鲁”代鲁国,是以孔子故里以代之,既有地理之所指,又有人文之尊重。其中的“士”,既有包括孔子以前的人,更包括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以及学生的学生,以及受其儒家思想熏陶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前551—前479),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此地是其父叔梁纥所治之邑。《索隐》:‘陬是邑名,昌平,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辞海》谓,‘陬,古邑名,即郛,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陬,春秋时为郟国国都。公元前614年,即在孔子诞生前六十年,郟迁都于郟(在今山东郟县东南)。陬即为鲁邑。据考证,陬邑约在今曲阜东南的尼山、鲁源一带。也就是说,孔子所生之地陬,本属郟国首都,郟国迁都后,遂成为鲁国之邑。”

孟子即孟軻,《史记·孟荀卿列传》:“孟軻,鲁人也。”(即郟)《索隐》云:“邹,鲁地名,又云郟,春秋时称郟国,又称郟娄国。战国时,鲁穆公改号为邹。《通志·氏族略》”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时在公元前377年之前。说明孟子出生前,郟已改为邹了。所以庄子亦称原郟国之都“陬”为“邹”。

这就是说,孔子所生地邹,与孟子所生地邹,虽同为邹而地名异也。但两地相距很近,而且孟子的出生地邹,也与孔子后来所迁居的曲阜相距亦近。所以孟子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因之《辞海》所谓“孟子生于邹国”,乃是讹误,其时邹为鲁邑,并非国也。

再回到《庄子》文章中看,那原是颂古,颂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因为他们都是受周礼和儒家思想教育之人。而孔子——这位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史记·孔子世家》“赞”中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谓将孔子的学说看做判断衡量的最高标准,可谓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接着是“贬今”,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古代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人毁掉了。此处的“天下大乱”,就是指战国时代的当时,难怪孟子也慨叹:“由孔子而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近)也,然而无有乎尔(没有继承的人),则亦无有乎尔(也竟然没有继承的人了)。”(《孟子·尽心下》)

庄子和孟子是同齡人,其时自然属于庄子所说的“今”之范畴,当然与“古”无关,自然也与“邹鲁”无关。孔子早孟子于庄子二人一百七十八年,自然属“古”。因而以邹鲁代人,指孔子也;以邹鲁代地,指鲁国也;以人之地,言孔子至圣也。 □杨乾坤

「邹鲁」与孟子无涉

连良对其演唱称赞不已。

2 会写京戏

作为剧作家的老舍先生以话剧享誉文坛,他的话剧《龙须沟》《茶馆》可谓家喻户晓,其实他还写了不少京剧剧本。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创作了抗战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二娘》《王家镇》。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京剧《十五贯》《青霞丹雪》《王宝钏》。

我曾祖父的著作《徐兰沅操琴生活》中有许多老照片,由于印刷质量不好,书中的照片都不甚清晰,但我还是从一张影像模糊的照片中辨认出了老舍先生。照片上老舍先生的左边是我的曾祖父徐兰沅,右边是身穿戏装的马连良。这张照片是何时拍摄的,又是缘何而拍摄的呢?1959年3月8日《北京日报》的《演出广告》写着:“1959年3月9日晚,由老舍改编的京剧《青霞丹雪》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首次演出。主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周和桐;导演:王雁;音乐设计:徐兰沅、唐吉、李慕良;舞台美术设计:张雪峰、安振山、赵金声。”这段文字道出了这张老照片的身世。这张老照片既记录了老舍先生和我曾祖父的友情,又见证了他们的艺术合作。

《青霞丹雪》是一出新编历史戏,剧本根据《今古奇观》第十三回《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改编而成。京剧剧本的创作对编剧的要求很高,编剧既要有文笔,更要精通京剧。因为老舍先生会唱京戏,所以在创作剧本时,他用手有板有眼地敲着桌沿,一边闭目凝神唱着自编的戏词,一边不断修改自己的戏词。他既把自己当编剧,又拿自己当演员。他的创作很符合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说的“手则握笔,口即登场”。他编的戏词里有动作身段,有表情神态,因为他最知道演员需要什么什么唱词和念白。他除了把自己当编剧、演员之外,还从观众的立场出发进行创作,因为他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戏。

3 广交友友

京戏是角儿的艺术,爱戏的老舍先生自然结交了不少京剧界的朋友。梅兰芳、尚小云、萧长华、郝寿臣、马连良……都是老舍的好友。老舍爱他们的艺术,更欣赏他们的人品,在创作京剧剧本时还会向他们请教,跟他们交流。

1963年1月29日(农历大年初五),老舍先生到我们家给我曾祖父拜年。我曾祖父送给老舍先生一

件特殊的礼物。老舍先生甚是喜爱,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此事。老舍先生在《戏园漫谈》一文中写道:“首先说一个故事。今年的春节,徐兰沅老先生(徐老给梅兰芳大师伴奏了几十年)送给我一个礼物。那是梅先生画的一张扇面。这样的扇面,是梅大师当年唱《晴雯撕扇》时候用过的。”

我曾祖父为什么会送给老舍先生一个撕碎了的扇面?老舍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个特殊的礼物?或许这就是朋友间的默契。我曾祖父知道老舍先生喜好书画,更了解老舍先生的为人。老舍先生虽深知梅先生的绘画造诣极高,但绝不会以朋友的身份主动向梅先生索画。况且这个扇面是梅先生在舞台上使用过的道具,又是梅先生亲手绘制的,这个扇面既有艺术,又含故事,实乃不可多得。老舍先生不仅从这个小小的扇面中读出了梅先生对艺术的一丝不苟,更读懂了我曾祖父的心意。最好的礼物不见得有多贵,而一定要可心。

旧时京剧伶人虽然没有什么学历,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擅长翰墨丹青。我曾祖父最喜书法,有“梨园第一书家”之美誉。老舍先生曾经送给我曾祖父一把折扇,折扇的一面是老舍先生手书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七律《赤壁·依然形胜扼荆襄》,下款题:兰老书家正字,老舍录陬北句。另一面是老舍的夫人胡絮青先生画的一幅《竹石水仙图》,上款题:养徐老正教,篆画。很可惜,这把扇子如今不知流落何处。作为“清风纸半张”的折扇,既承载了书画雅趣,又记录了人情过往。诗画相赠的情谊是清风明月,清而不浅,淡而有味。

老舍先生爱京戏,但不是溺爱,而是一种深沉的大爱。老舍先生把爱京戏、爱家乡、爱祖国融为一体,他认为如果因为喜爱京戏而玩物丧志,耽误了国家大事,那么宁可不要京戏。爱之深则忧之切,忧之切则虑之远。老舍先生对以京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四世同堂》中,祁瑞宣很喜欢安静的老式点心铺,那里面伙计干净,有礼貌,不会向顾客推销什么。其实,老舍先生很喜欢这样的店铺,但在短篇小说《老字号》中,老舍先生安排这样一家老式店铺被一家会推销的新式店铺挤兑倒闭了,他对这家老式店铺的感情是复杂的。老舍先生很明白,有些东西即便再喜欢,但对时代来说已经不大适合了。 □徐淳

当作家遇上笔名雷同

■ 往事

文集外佚作。全文如下:

冰森我兄:近见晨报有用“甲辰”署名之文章,不知者皆谓为从文所作,因此名弟已用之五年,为时已不不久矣。今晨副既另有人欢喜用此二字署名,即以此名奉让,亦无不可。惟该文既非弟作,掠美实所不愿,故请代为于《北晨学园》登一启事,用作申明。至为感谢。专颂著安。

弟从文 四月十日。
近有署名“甲辰”,在《北晨学园》登载纪念歌德及其他文字,不知为谁所作。因从文数年来在各刊物上所发表之作品,多用“甲辰”署名,故有疑及此等文字上即从文所作者,远道来函质问,无由奉答。查今年来在《北晨学园》用甲辰署名所登载之文章,皆非从文所作,特借申明,以示不敢掠美。

沈从文启
经查,《北晨学园》刊发署名“甲辰”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努力》,载1932年2月29日第255号;一篇是《纪念歌德的意义》,连载1932年3月28日、29日第272号、第273号。这两篇

文章均被安排在显要位置,可见其质量并不俗。时在青岛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沈从文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特地致信冰森,称这两篇署名“甲辰”的文章都不是他写的,为不损人之美,故请冰森“代为于《北晨学园》登一启事,用作申明”。

早在1927年1月1日,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诗歌《曙》时,就开始使用笔名“甲辰”。此后,有不少作品也是用这一笔名发表的。在致冰森信中,沈从文说:“既有人欢喜用此二字署名,即以此名奉让,亦无不可。”可是,1932年12月5日,他在上海《微音》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发表小说《战争到某市以后》,署名仍是“甲辰”。甚至到1933年8月1日,他在杭州《西湖文苑》月刊发表《废邸存底》时,署名还是“甲辰”。不过,这是目前所知道的沈从文最后一次使用这个笔名。

瞿冰森接到沈从文来信以后,曾去信问过“最近在本刊发表文章的‘甲辰’先生,他说署名常有相同的,既有

沈先生的声明就够了”。这位“甲辰”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待考。

署名相同,的确是一种常见现象。翻阅民国时期报刊,经常可以看到署名“巴人”“巴金”“舒舍予”“废名”“冰心”“柳青”“胡风”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并非全都出自鲁迅(周树人)、李尧棠(芾甘)、老舍(舒庆春)、冯文炳、谢冰莹、刘蘅华、张光人之手笔。遇到他人与自己署名相同的情况,有的作家也像沈从文一样,公开发表声明,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如曾有好几个人用“芦焚”这一笔名发表作品,弄得王长简不胜其烦。1943年5月24日,他写信给柯灵,希望利用其作品时将题目制版,以示与另一“芦焚”相区别(见上海《万象》月刊1943年7月1日第3年第1期7月号)。1946年8月12日,他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发表了一篇《致“芦焚”先生们》,宣布以后署名一律用“师陀”。因此,看到署名相同的文章,应当反复考证,判定其归属。否则,有可能会张冠李戴,将此“甲辰”误认成了彼“甲辰”。 □陈建军

风和日暖时端坐 疑在琉璃世界行

古人的冰车之乐



清张为邦、姚文瀚合笔《冰嬉图》,右侧为皇帝所乘冰床。

随着天气逐渐寒冷,北京城内的各大冰场也热闹起来,什刹海、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地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冰场上最受欢迎的项目莫过于滑冰车了。冰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交通工具,也是古人重要的冬季娱乐项目。《燕京杂记》有云:“东西往来,如泛银湖,又如皇宫,亦一韵事也。”

冰车也称“扒犁”,在古代称为“冰床”或“凌床”。《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可见,古人很早就有用于滑行的交通工具了。

我国北方一些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寒冷地区,会制作和使用一些冰雪上的交通工具。《北史》记载,北韦韦人“地多积雪,俱陷坑阱,骑马而行”。《新唐书》中也有拔野古“乘木逐鹿冰上”和一些突厥部落的人“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步,势迅激”的记载,这些“木马”应该就是早期的冰雪交通工具。

元代出现了狗拉的冰橇或雪橇,称为“狗车”。按照《札刺尔公神道碑》中的说法,狗车

在当时又称为“把”。元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驿传体系,称为“站赤”。站赤除了马站、牛站、车站、舟站外,在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还设立了特殊的狗站一十五处。这些狗站共养狗三千只,用以在冬季的时候拉狗车。按照《大元一统志》的描述,这些狗车“以木为之,其制轻简,形如船,长一丈,阔二尺许,以数狗拽之”,和现在的狗拉雪橇很相似,是当地冬季运送物资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至明代,狗站仍然保留,所使用狗车始被称作“扒犁”。至清代,这种扒犁使用得更加普遍,《竹叶亭杂记》记载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赫哲族人“冬时水冻,坐扒犁驾狗而行……日行可六七百里”。

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依靠人力拉动的冰车。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信安、沔、景之间”,即现在的河北沧州、霸州一带,“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这种“凌床”也就是冰床,它由人力拖动,连当地的官员往来都要乘坐。河北中部处于宋辽交界地区,凌床的出现可能受到了北方地区民族的影响。

到了明代,冰床逐渐成为人们冬季休闲娱乐的工具,尤其盛行于北京。《酌中志》记

载:“至冬冰冻,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交床类似于现在的马扎,藁荐就是草席,可见当时冰床的制作方式已经和现在的冰车十分相似。皇帝也会乘坐这种冰床游玩,《天启宫词》中记载:“西苑池冰既坚,以红板作拖床,四面低阑亦红色,窄仅容一人。上坐其中,诸玛于两岸用绳及竿引后推,往返数里,瞬息而已。”皇帝御用的冰床不仅装饰华贵,还需要好几个太监同时操作。

明代的冰床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帝京景物略》中有:“冬水坚冻,一人挽木小兜,驱如衢,曰冰床。这是一人乘坐的小冰床。《倚晴阁杂抄》中有:“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都蓝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诚豪侠之事也。”这是可以同时让很多人坐上的连环冰床,可见古人的娱乐精神一点都不亚于今人。在明代北京,有些贫穷百姓甚至以拖冰床谋生,《酌中志》记载:“近京贫民,于皇城内外,凡有冰处,拉拖床以糊口。”

到了清代,北京的拖冰床活动更为热闹和普遍。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太液池之五龙亭前,中海之水云榭前,寒

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那时制作的冰床,已在底部镶上钢条,减少摩擦。同书中还有“各城外护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步。更将拖床结连一处,治酌陈肴于上,欢歌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较之坐骥乘车,远胜多矣。”滑擦就是溜冰,可见在清代冬季,北京的冰上运动已经开展得非常丰富了。

在清代,皇帝和王公大臣都热衷于乘坐冰床。乾隆皇帝有《腊日诗》曰:“破腊风光日日新,曲池凝玉净无尘。不知待渡霜华冷,暖坐冰床过玉津。”《榆巢杂识》中记载皇帝的冰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毡履及饰以龙凤者。”御用的冰床不仅装饰华美,还配有保暖的毡履,清代宫廷在举行冰嬉时,皇帝就会乘坐这种冰床观礼。《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清制,西苑门内有冰床,为王大臣设,床甚华美,如绿呢车箱,行绝驶。”《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载,“近日王公大臣之有恩命者,亦准于西苑门内乘坐拖床,床甚华美,上有盖如车篷,可避风雪。”

对于清代北京人来说,乘坐冰床早已是一项趣味盎然的娱乐活动了。《燕京杂记》:

“东西二壕,冬月冰结,设木榻渡人,谓之冰床。床上可坐数人,一人挽之,疾于车马。有好事者联属数床,置酒其上,东西往来,如泛银湖,又如富官,亦一韵事也。”三五好友一边把酒言欢,一边往来滑于银湖富官之间,确实是人生一大韵事。杨米人友《都门杂咏·冰床》曰:“十月冰床遍九城,游人曳去一毛轻。风和日暖时端坐,疑在琉璃世界行。”

不过,在河道纵横的天津,冰床还保留着交通工具的作用。清张焘《津门杂记》中记载:“(冰床)其形如床,可容三四人,高仅半尺余,上铺草席,底嵌铁条,取其滑而利行,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撑之,驱驶甚速。每到天寒地冻,冰排盛行,往来密如梭织,四通八达,彼往咸宜。”这种实用的冰床不再靠人拖拽,而是像撑筏子一样用竹篙撑着走,是冬季便宜而重要的交通工具。 □刘疆